

古籍版本鑑定从谈

魏隱儒 毛金雨 編著



古籍版本鉴定丛谈

魏隐儒 王金雨 编著

印刷工业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分十章。从古籍版本史略、分类、术语、用纸、印刷和鉴定方法诸方面,对古籍版本鉴定作了详细论述;对版本学、目录学等相关内容及版本鉴定中应注意的问题作了简要介绍。

本书内容丰富,通俗易懂。作者积近三十年之经验,从实际工作出发,全面、系统地进行阐述;范围广、实用性强;适于古籍版本鉴定人员、图书馆工作人员、大专院校文科师生以及广大古籍爱好者阅读。

古籍版本鉴定丛谈

魏隐儒 王金雨 编著

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翠微路2号)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 $1/8$ / 32 字数:165千字

1984年4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2.00元

统一书号:7266·02

出版说明

一、本书讲的是古籍版本鉴定，故书内出现的书名、人名，有的仍沿用繁体字。其它除不用繁体会引起异意的个别字以外，一律用简体字。

二、本书在编辑加工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副教授郑如斯同志的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序

提起古籍版本，常使人联想到古董，从经济价值着眼，越古越贵重。旧时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常以搜求玩赏古籍而谬托风雅，致使研究古籍版本者往往蒙受玩物丧志之讥。然而版本学之真正价值固不在于斯也。

研究版本有两方面重要意义：一为校正错讹脱漏，求其准确。在雕版发明之前，书籍靠抄写流传，辗转传抄，自然会发生错讹。即雕版发明以后，有些书也往往经过一段传抄，然后才付雕印。古时雕版工人有文化者少，雕刻时依样葫芦，也常有鲁鱼亥豕之误。而书坊只图谋利，不作精细校对，甚至偷工减料任意删削。因此同一书之不同版本，即有优劣之别。如前人所指宋麻沙本《周易》将“乾为金坤为釜”刻成“乾为金坤为金”，学子据以诵习，误人子弟，为害非浅。又如坊刻医方，将“錡”刻成“锡”，以锡医病，岂非杀人！至于稗官小说如《水浒》、《红楼》，则版本歧异，不可胜举。是故历代治学者皆十分重视版本。朱熹距韩愈不远，即有《韩文考异》之作，更何况流传既久之远古文献，一般宋元刻本尚较精审，明人则妄改古书，恶习流行。清代朴学大兴，终生从事考据校勘者蔚然成风，至乾嘉而极盛，如黄丕烈、顾千里校勘之精，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研究版本之另一意义为鉴别真伪。古籍既视同古董，于是便出现赝品，以明清充宋元，以翻刻充原刻，以残缺充完帙。鱼目混珠，必须鉴别。伪书伪卷时有所见，我曾见过一卷唐刘宴写经，署贞观年号，此作伪之下者，其精于作伪者，可以乱真，非博闻广见者，几难分辨。尚有托名古人者，如金圣叹伪造施耐庵《水浒传》序，冒七十回本《水浒》为古本。也有剽前人之作为己作者，如清初

屈大均之《广东新语》列为禁书，乾隆间李调元视学广东，得其刻本，略为改窜，攘为己作，改名《粤东笔记》。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晚近雕版古籍流传渐少，十年动乱期间毁损尤多，线装古书已成罕见物，今后古代文献只有依靠新印本流传。解放以来新印大量古书，大多经过精细校勘，但也有不少的错讹层出，不堪卒读。一则所据非善本，未广搜版本，互校正误；再则重新排印，亦未精密校对。略举数例，可见一斑。一九五九年新印之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我曾据一《补编》残抄本略加校对，仅四十七条中即发现错情二百二十七处。其中“茶式”条，将“宋榷茶之法最苛，徽宗之初茶利至五百万缗”。“徽宗”印成“徽州”，将徽宗时全国最苛之税，加之于徽州一地，一字之差，成为奇文，而“苛”也印成“奇”矣。“贡害”条：太仓州岁贡白苧布“六千匹”，印成“六十匹”。六十匹何能成害？此外“鸿胪卿”印成“鸿卿”，太监止“七品”印成“四品”等等不胜枚举。又如一九五七年新印清初周亮工《书影》，原书十卷只印前五卷即充完本。此书赖古堂原刻本及怀德堂翻刻本，我在北京前后见过三部，都是十卷完本，而出版家竟据一残本草率印行。卷首姜承烈不满七百字之短序，即有错情四处，正文可想而知。此种书每版印数以千万计，后人古本难见，只有以讹传讹。谬种流传，虽不比焚书禁书之惨烈，其有害亦实非浅鲜，此皆不重视版本疏于校勘之恶果也。昔人顾千里校书，穷搜版本，反复互校，一书校过十七次之多。这种严肃认真态度，实在应该学习与继承。

由此可见，版本学、校勘学对今后继续流传祖国文化遗产是何等重要！这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提供了这方面的丰富知识，把古籍作了精密的科学解剖，作了具体而微的详尽论述。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它不仅可以普及古籍版本的知识，而且可作为专业者之工作手册。此书之出版，必将大有裨益于祖国文化遗产之整理与继承也。

慕 湘

一九八三年十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版本学与目录学	(1)
二、研究版本学的意义	(5)
三、古籍版本鉴定在版本学中的地位	(8)
四、研究古籍版本鉴定的基础	(12)
第二章 古籍版刻史略	(16)
一、唐、五代的雕版事业	(16)
二、宋代的雕版事业	(17)
三、辽、金、西夏、蒙古时期的雕版事业	(28)
四、元代的雕版事业	(32)
五、明代的雕版事业	(38)
六、清代的雕版事业	(43)
第三章 古籍版本的类型	(45)
第四章 古籍版本术语	(59)
一、书叶上各部位的名称术语	(59)
二、装订形式和装订技术上的名称术语	(61)
三、文内常用符号	(66)
四、版本鉴别上使用的术语	(67)
第五章 古籍版本鉴定的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	(69)
第六章 历史上古籍的用纸	(77)
第七章 雕印本的鉴定	(84)
一、牌记、封面和序跋	(84)
二、题跋、识语和名家藏章印记	(89)

三、书名冠词	(91)
四、讳字	(92)
五、刻工姓名	(101)
六、行款字数	(116)
七、各家著录	(116)
八、版刻时代特点	(117)
第八章 活字本的鉴定	(125)
第九章 批校、抄本的鉴定	(131)
第十章 古籍版本中伪本的鉴定	(141)
附 编 研究古籍版本、目录学应具有的知识	(157)
一、有关目录学方面的知识	(157)
二、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和重要学派	(182)
三、国家藏书阁——七阁	(184)
四、常用工具书简介	(185)
五、后记	(195)

第一章 绪 论

一、版本学与目录学

版本学的历史,至少已经有两千多年了。它研究的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图籍著述的增多而日益丰富起来。那么,版本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呢?简而言之,它是以各种图籍的抄本、批校评注本、稿本和印本等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细致地说,它是以这些版本、特别是以印本的纸张、墨色、字体、刀法、藏章印记、款识题跋、刻印源流、行款版式、封面牌记、何者精善、古今真赝以及传抄情况等,作为研究对象的。

为了对版本学的发展和“版本”一语的含义有一个比较确切的了解,这里先谈谈“版本”一语的来源。

“版本”一语的来源,是在印本书出现以后产生的。在印本出现以前,只有“本”的说法。“本”的使用,是从西汉开始的。《北齐书》卷四十五中说:“即欲刊定,必藉众本”。樊逊所谓:“按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合中外书若干本,以先比较,然后杀青”可见“本”之使用,在刘向校书中秘就已经产生了。证以李善注《文选·魏都赋》引《风俗通》云:刘向在《别录》中有“讎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讎也。”而他所藉的众本,有所谓中书、外书、太常书、太史书、臣向书、臣某书等本。于此可知,“本”即一书的不同写本。“本”的命名之意,是说“杀青治竹所书,改治已定,略无讹字,上素之时,即就竹简缮写,以其为书之原本,故名之曰‘本’,其后竹简既废,人但就书卷互相传录,于是‘本’之名,遂由竹移之纸,而一切书皆可称‘本’矣。”对于“本”的意义,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一有这样一段话,他

说：“书之称本必有所因，《说文解字》云：‘木下曰本’。而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赫蹏纸，颜师古注，今书本赫字或作击，是书本之称，由来已久。至宋，刻板大行，名义遂定。”唐、五代后，镂板盛行，一书刻成，相率模印，与杀青上素之义颇相符合，故称之为“版本”。

版本一语，开始见于文献的，就所知见，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讐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至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曾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蜀大字旧本、蜀本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併兴国于氏建安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等语，这是“版本”一语见于较早的文献记录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版本”已从专指刻本而言的内涵在逐渐扩大，如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换句话说，“版本”的内涵已经具有了非雕版印本和雕印本的意义。到了近代“版本”的含意更为广泛，它把非雕版的影印本、石印本、拓印本、铅印本、晒印本、钐印本、油印本等也包括在内了。

谈到版本学的渊源，必然要涉及目录学的兴起。开始，版本学是做为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和目录学同时产生的。对于目录学的建立，我国学者认为，它的起源可上溯到春秋时期孔子删诗、书之际。但主要认为目录学的正式建立，是在西汉成帝刘骃河平三年（公元前 26 年）刘向受诏校典中秘群书开始的。后来他的

儿子刘歆又继续为之。向歆父子先后分别撰《别录》、《七略》，它的体系才逐渐完备，目录学也就从此建立起来。^①

图书典籍是社会进步、科学文化发展的记录和总结。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促使图籍著述日益增多。反之，图籍著述的增多也促进了社会、科学、文化的新发展。在这个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科学文化向着更高阶段发展；另一方面，图籍著述种类和数量愈益繁多。这样，整理和研究图籍文献的工作也就随之而提上了日程。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图籍的复制，只靠手写传抄一途，无论是简策还是卷子，都不例外。而传抄过程中是难免鲁鱼亥豕的错误的。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复制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由于写样、上版，雕镌和刷印等步骤的增多，虽几经核校，终难消除脱漏和讹谬。加之雕版材料本身特质的局限，如刷印数量过多，版片必致漫漶不清，且版片又极易遭到兵燹水火的毁损，所以同一图籍，就有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学人编纂校订的不同刻本。这样，不仅某一刻本会有脱漏讹谬，就是刻本与刻本之间也会产生差异。因此，在整理和研究文献时，不但要分析各种著述的渊源，即所谓“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著录其卷帙多少，而且要广搜众本，校勘其字句异同和讹谬脱漏。整理和研究文献，就是对某一著述的解题叙录、条类编目、校勘舛误和考定版本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最初，这几个方面的研究都综合在一起，称为目录之学。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就是这种综合的开山。

在刘氏父子相继典校中秘群籍的时候，他们所搜集的众本都是写本，今日版本所研究的一些内容，如纸张、墨色、字体、刀法、初

① 《隋书经籍志·簿录类》：“古者史官既同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没，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又说：“刘向等校书，每一书就，向辄别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说：“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及汉世，刘向、刘歆，奉诏校书，撰为《七略》、《别录》，而其体裁遂以完备。”

刻、后印、翻刻、递修、装帧式样……等还没有出现。当时考订版本,在研究和整理文献的工作上,还不十分繁杂。但到印刷术发明之后,整理和研究文献工作就出现了纸、墨、字体、刻书序、跋、牌记、封面、藏章印记……等新的问题。如果得不到确切的考订,就会给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造成困难。如果还象以往那样,把版本学的研究仍附于目录学的综合体系之内,就很难负起它所应研究的丰富内容的重任。所以,版本学开始从作为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说从一个附庸部分,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成为目录学的一个分支。它在目录学的体系中的位置,可以下表示之:

目录学

提要学:源于刘向,每校一书,即为之叙录,其后总而为《别录》和刘歆《七略》中的《辑略》。

分类编目学:源于《七略》中的《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别录》和《七略》虽早已亡佚,但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记,是可以约略见其梗概的。

校勘学:校勘字句的脱漏讹谬,其源可上推到春秋时期。《国语·鲁语下》就记载了正考父用周太史藏本校订了《商颂》所存乐章的事。《公羊传·昭公十二年》载有孔子校订了《春秋》,昭公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是“公子阳生”之误。西汉刘向校书,又有新的发展。

版本学:刘向校书,广搜众本,即《北齐书》所云:“即欲刊定,必藉众本。”这方面较早的著作如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为开一书兼载数本的类例。

版本学,既然由于图籍整理和研究的历史需要,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它研究的特点是什么呢?对于版本学,顾廷龙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中肯。他说:“什么叫做‘版本之学’,……在印刷术发明之后,经过不断的刻印,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本子。有了许多不同的本子,就出现了文字、印刷、装帧等方面的许多差异。研

究这些差异,并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找出其规律,这就形成了版本之学。”(顾廷龙《版本学与图书馆》)。

版本学虽然已经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和目录学以及目录学的各个分科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二、研究版本学的意义

如前所述,版本学是和目录学同时产生、做为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附庸于目录学的。随着图籍的历史发展,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研究和整理图籍文献中发挥着作用。

由于它是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伴同目录学产生的,当时研究内容比较简单,对研究版本学的意义了解的不多,因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隋书经籍志·簿录类》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泯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显然,《隋志》认为,从“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到“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的“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的研究,也就是叙录解题的学术史之体,才是“古制”(即正规)。这种观点,在唐代目录学家僧人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序》里说得更完整详尽。他说:“夫目录之兴也,盖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章学诚在《校讐通义》里,又把它予以概括,他用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两句话。《隋志》还进一步肯定说,不符合这种要求的,就是“未为典则”。

上面所引,从隋到清代的这些论述,说明了自隋以来认为目录学的主流,应该是“叙录”之学,也就是提要或解题、书序等等学术史方面的研究,才是“典则”,而对于从“条其篇目”发展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图书分类与编目之学,和从广搜众本,以供校讐,发展为研究图籍的纸张墨色、刀法字体、装帧式样……等等的版本

之学，则认为是“浅薄不经”。朱一新甚至在其《无邪堂答问》卷二中说：“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讐之祖。……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榷学术，洞彻源流，……目录校讐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定文字异同为校讐也。……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多识书名，辨别版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很明显，这种观点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很多学科在其早期，包括范围都很广。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些包括范围较广的学科，开始、并逐渐发生变化，分化出一些独立的学科。这些新的学科，既承担着自身独具的研究任务，又和原来的学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到了近世，学术日益昌明，学科分化更是常见不鲜。如物理学分化成普通物理、原子物理、地球物理、航天物理……等部分。其中除普通物理带有一般地综合性研究之外，其它均已形成物理学的独立分科。目录学自不例外。版本学从目录学的总体中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图籍发展的必然结果。

版本学的研究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重要意义。对此，历史上有如下两个故事：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上，讲到“《汉书》‘中外禔福，’字当从示，而江南书本多误从手。”（编者按：这里指的是“提”字，从手作“提”。）；“《后汉书·酷吏樊翊传》‘宁见乳虎穴’，江南书本皆误作六。”；还在同书《勉学篇》里讲到一个大官，因读误本书，闹出一段笑话。事情是这样的：一次这位大官，受到别人送的一块羊肉，他回信致谢，写道：“损惠蹲鴟”。大家看了都很惊讶。“蹲鴟”语出左思《蜀都赋》，刘渊林注的很明白，“蹲鴟，芋也”，这位老爷，读了把“芋”错写成“羊”的误本，因而出了这次丑。

南宋爱国诗人陆放翁，在他所著《老学庵笔记》里，曾记载：一次有一个考官，给考生从《周易》上选了一个命题，“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受到考生们的质问。原来他的根据是建阳麻沙本《周易》。这个本子把“坤为釜”中“釜”字上的两点丢了，因而误成“坤

为金”，以致这位考官出丑。

类似的故事还有，无需一一例举。于此可见，研究书籍的版本是很重要的。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这里，对版本研究在学术上的重要性说得很具体。读书如此，研究和整理文献，也同样如此。

那么，研究版本学的意义何在呢？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1. 刊误纠谬。刘向父子校书中秘，广搜众本，首先是校讐文字异同，即所谓“得谬误”。文字审定是研究的初步功夫，这一点做好了，才能既免“贻误后学”的弊害，又可使学术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虽不象解题那样“撮其旨意”、“穷源竟流”、“分明类例”，以见学术承袭，但做为致力这些方面必不可缺的基础——精善准确——来说，它的研究功用是很有益的。

2. 审定真伪。版本学在考定古籍真伪上功用也是很大的。约略地说，版本研究，可以识别古籍真伪，篇目分合和书籍的残全佚阙，何者精善。

3. 文物鉴别。研究版本，不仅有益于读书治学，而且在保护文物上的功用也日益重要起来。我国自七、八世纪之交发明雕版印刷术以来，至今，不仅唐、五代刻本所存无几，就是中国印本书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宋朝刻本，也已稀少。早在明清之际，从宋槧本的文物价值，已可很明显的看出。如汲古阁主人毛晋，在征求宋刻本时，就曾按叶计价了。其后，更是价值日昂。这不仅是供求关系的反映，也是其文物性的反映。因此，古籍版本的作伪出现了。到现在，不但宋刻本流传罕见，就是元、明刻本也不太多了。旧时书贾射利，多方作伪。在研究和整理古籍文献和保护文物，鉴别真伪上，如无版本研究，以资识别，显然是不行的。其意义的重要于此可见矣。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版本学的意义，决不是“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之不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而是于学术，

于考古,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古籍版本鉴定在版本学中的地位

版本学研究的对象,随着历史上图籍种类和数量的发展而日益丰富。关于我国图籍的种类和数量,人们常用“浩如烟海”一语加以形象地描绘。据有人所做的概略统计^①,除近代现代的图籍之外,仅就“古籍”^②而言,不下七八万种之多(关于“古籍”或“古

① 方厚枢《从目录学入手》一文说:“我国古籍数量浩如烟海。仅收入各种丛书的书,据《中国丛书综录》子目统计,就有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一种。没有收入丛书的单刻本,……清代以前的……,估计不会少于一万种。清朝一代的……,据……《贩书偶记》……,约有一万种;再加上小说,戏曲……,据估计,我国古书的总数约有七八万种之多。”(原载《光明日报》,转引自河北省文化局编《古旧图书业务知识》1962年版380—384页)。

李诗《谈谈我国古籍》一文说:“我国古籍非常丰富,……大致的估计,现存……约有七万种到八万种,……。我们已有的数据有下列的几个:

- a. 收入古籍丛书中的单种古籍,……《中国丛书综录》……统计,其数字为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一种。
- b. 未收入丛书中的单刻本……《贩书偶记》的记载……(清朝一代的)约有一万种;清代以前遗存的单刻本,……估计也不会少于一万种。
- c. “地方志”……,《中国地方志综录》的统计,是七千四百十三种,……。

以上三大数据,就接近七万种,还有大量的通俗小说、戏曲、唱本和佛经、家谱、金石拓本等等没有统计在内(见《文汇报》1961年11月1日、8月11日版)。

② “古籍”是个笼统的名词,指书籍著作的时代划期而言。我们现在一般地划“五四”以前的著作为“古籍”(见《文汇报》李诗《谈谈我国古籍》)。

李颖珊《古籍分类的研究》中说:“什么是古书:我国古籍,至为众多,应当分类的,固不在新旧上有所区别。但是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古书分类,在事实上,不能不把新书旧书加以划分,以定范围。因此,我们暂时认定,所谓古书是指鸦片战争以前,即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前人们所著、所印写的书籍。为了扩大研究,推广用途,近代之人(包括外国汉学研究者)所著而包含的内容,均为古事古物(如考古史与金石甲骨文字等)和说古经、辨旧事的一类书籍,我们也不能不认为是与古书有关的著作,而以古书同等对待。至若古书重刊,古书新印,书虽出于近年,而内容全系古籍,那就不问他装订如何,不能不视为与古籍一样了”。(1958年7月在古籍训练班的讲话)。

《古旧书业务知识》一书上说:“什么是旧书?所谓‘旧书’是为了区别于‘古书’而论的。我们一般习惯上把木刻本线装书称作‘古书’,把铅印本的平装或精装本称为‘旧书’。从时间上说,旧书的出现,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又不能完全按历史分期的

书”一语的理解不尽一致)。在古籍版本鉴定上(就现阶段来说),古籍一般是指较早的木刻线装本、传抄本。其时间则指宋、元、明、清刻本、抄本等,更早的自不待言。这样丰富的文化典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多次的传抄与版印,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写本和印本,即版本,是很自然的。因此,在版本上自然就有早晚、写刻、精劣之分。这就是为什么远在汉代——尽管那时还处于写本时代,像现代版本学的一些研究对象还没有出现——在收藏保管和整理典籍上,就有了类似“善本”的概念的原因^①。据此,可知当时是很重视“版本”的考究的。及至版印盛行的宋代,“善本”一语就正式出现在文献记录上了^②。在写本时代,虽传写有早晚之分,但其“善”与否,主要在于字句异同和脱漏讹谬上,故考究的方法是“精于讐对”。印本书出现以后,其“善”与否,除各本之间有字句异同,脱漏讹谬外,还出现了刻印的精粗之分。因此在版本的考究上,在“精于讐对”之外,还须看其刀法字体,纸张墨色……。加以书籍在流传过程中,极易遭到毁损而残缺亡佚,以致精善善本渐渐稀少。这就大大增加了“善本”作为学术研究资料和工艺制品遗存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文物遗存,其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书肆间为了牟取高利,常在稀少的版本上做伪。至此,版本的考究,在异同脱讹、版刻精劣之外,又须辨别其真赝。识别“真赝”的重要性,是在宋、元甚至明、清刻本日见稀少的历史条件下才明显地提上日程的。可以想见,古籍版本鉴定,或一般的说版本鉴定,当会随着图籍日益丰富和研究整理文献工作的发展,而日益扩展其研究内

办法,把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刊印的书籍都列入‘旧书’范围。因为这个时期我国固有的手工雕版印刷书籍还在广泛的使用。大体上把凡是用机械印刷的书籍,包括铅印、石印、影印、胶版等印行出来的书籍列为‘旧书’是可以说得通的。”(北京市图书发行印刷职工工业校讲义,1964年7月)。

① 《汉书·河间献王传》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得善书(按,意即善本)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

②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而藏者精于讐对,故往往皆有善本。”